



汉文西夏文献之特点及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胡玉冰

西夏国是由党项拓跋氏于 11 世纪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①，国号“大夏”，自称“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汉文典籍一般称“西夏”、“夏国”或“夏台”。研究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及其治乱兴衰的历史，主要依靠西夏文献和西夏考古文物资料。西夏文献包括两大类：一类为西夏国原有文献，即在西夏未亡国前，由西夏国境内各民族人物撰写的各种文献；另一类为与西夏相关的文献，即由非西夏国人撰写的、记述内容与西夏国有关的各种文献。西夏文献既有传世文献，也有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以典籍为主，出土文献除典籍外还有部分金石材料。汉语文种的西夏文献在西夏文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我们把与西夏国相关的汉文文献称之为汉文西夏文献。

汉文西夏文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统而言之，凡记述内容直接或间接与西夏相关的各种汉文文献都可称做汉文西夏文献，此为广义的汉文西夏文献。广义汉文西夏文献中包括与党项、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有关的汉文文献。西夏政权主要由党项拓跋氏创立，了解党项族的起源和社会组织的演进及以拓跋部为核心的平夏部落的迁徙活动是西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所以与党项有关的汉文文献也是研究西夏时必须利用的重要文献。西夏与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之间关系密切，研究这种关系也是西夏学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所以与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有关的汉文文献也是研究西夏的重要参考文献。国内已经有学者对与党项、吐蕃及回鹘有关的文献做过深入研究和细致梳理^②。狭义的汉文西夏文献是指，记述内容直接与西夏有关的各种汉文文献，主要包括记事涉及夏州地方政权史、夏国史及夏国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的各种汉文文献。本文所述“汉文西夏文献”均指狭义汉文西夏文献而言。

^① 关于西夏国拓跋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西夏拓跋氏与羌族同源，有的则认为其族源出鲜卑族，参见王天顺主编：《西夏学概论》第七章第一节《党项民族与社会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9-191 页。

^② 参见白滨：《党项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汤开建、刘建丽：《宋代吐蕃史料集》（一），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汤开建、刘建丽：《宋代吐蕃史料集》（二），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9 年版；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

一 文西夏文献之特点

汉文西夏文献，自宋迄清，代有其书^①。宋代是汉文西夏文献的创编时期。由于宋夏战事的客观需要，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汉文西夏专书，时人编纂的某些文献中也设有西夏专题。另外，史书、文集及笔记中也散见有丰富的西夏史料。宋人著西夏专书传世者很少，而西夏专题文献和其它散见史料大多传世至今，成为今天治西夏史最直接的汉文原始材料。辽金两代都曾与西夏并存，成于这两代的文献中，也有关于西夏的记载，这一时期的文献也是原始的汉文西夏文献。元代是汉文西夏文献的选编删汰时期。元代史家在统治阶级的授意下，秉承正统封建史学的修史思想，对元代尚存的大批西夏文献精心删汰，编写了只有4卷内容的宋、辽、金三史《夏国传》，此外有些西夏史料则散见于三史的帝王本纪、志、表及传中，而更大量的、珍贵的汉文西夏文献在元代三史编修的过程中被人为地删汰掉了。三史《夏国传》及散见于三史中的西夏史料是今天研究西夏史的基本史料。成于元代的一些石刻文献对于研究元代唐兀氏及西夏遗民有特殊价值。明代是汉文西夏文献的重辑、重修期。鉴于元代史家留给后人的遗憾，明代有学者开始注意对汉文西夏文献重新辑录，有的则试图编修新的西夏专史，祁承燾的《宋西事案》就是这种尝试的产物^②，但无论是重辑还是重修，取得的成就都不高。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学者在编修宁夏地方志时，开始重视宁夏历史上的西夏时期，选材上注意对西夏史料的辑录，同时开始有意识地爬梳西夏史，力图对西夏史做出全新的考证。在这方面，朱楠开其绪，胡汝砺毕其功。另外，成于明代的部分方志中保留有相当丰富的与西夏遗民有关材料。清代是汉文西夏文献编修的勃兴时期。受乾嘉学派考据学风的影响，清代有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西夏历史，他们钩沉索隐，尤其是从宋元时期的文献中辑录出大量的西夏史料，在各自编史思想指导下，编写了数量可观的西夏专史，如周春编《西夏书》、张鉴编《西夏纪事本末》、吴广成编《西夏书事》等。另外，西夏史的专题研究也日渐深入，如徐松著《西夏地理考》，对西夏地理进行深入考证，张澍辑《西夏姓氏录》，对西夏姓氏和职官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材料，王仁俊辑录的《西夏文缀》则对西夏公文研究提供了材料利用上的方便。近代也有学者对汉文西夏文献进行爬梳，编修了一批有研究价值的西夏专书，如戴锡章《西夏纪》、罗福颐《西夏文存》、罗福苾和罗福颐《宋史·夏国传集注》、李鸿仪《西夏李氏世谱》等。清及近代部分金石学文献中收录的一些石刻材料也为研究西夏及宋夏关系提供了难得的一手材料。

客观地说，正是由于大量汉文西夏文献的传世，才使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可能，而且有些情况我们只能通过汉文西夏文献去了解。

作为一类有特殊研究价值的古文献，汉文西夏文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文献载体看，汉文西夏文献以纸质典籍为大宗，也有少量石刻文献。纸质典籍自宋迄清，代有其书。石刻文献宋、元、明各朝均有，尤其元朝为最多。莫高窟、榆林窟、万部华严经塔等处题写于元代的与西夏有关的题记也是一种载体形式特殊的文献材料。

第二，从文献流传情况看，大部分汉文西夏文献特别是成于宋代的西夏专书文献都已经亡佚。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战乱和中原王朝统治者有意识地禁毁而造成的，有些文献则属于自然消亡。部分已经亡佚的

^① 参见拙作《汉文西夏文献述要》，《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② 参见拙作《〈宋西事案〉考略》，《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汉文西夏文献，可以根据书目或其它文献记载能获知其编著者及文献名，甚至还可能了解该文献的主要内容。有些汉文西夏文献的内容已经被采录到了其它文献中传世，但无法钩辑出原著的内容。

第三，从文献内容及史料价值看，以军事、政治类史料居多，经济、文化类史料比较缺乏。成书于宋元时期的文献史料价值最高，这些是汉文西夏文献中最基本的文献。成书于明清时期的西夏专书文献主要是对宋元汉文西夏文献的撮抄和改编。另外，由于封建时代史家对待西夏历史存在所谓的“正统”和“偏安”之见，加上受到特定时代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史家所编修的部分西夏史料记载失实，不可轻信。

第四，从传世文献看，史、子、集诸部文献中散见有丰富的汉文西夏史料，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下文简称《长编》）、《名臣碑传琬琰集》、《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等史籍中，都散见有丰富的汉文西夏史料。宋人别集如《范文正公集》及史料笔记如《涑水记闻》、《儒林公议》等文献中，也散见有丰富的汉文西夏史料。成于元明的部分方志中，杂有一些与元代唐兀氏及西夏遗民有关的史料，这些也是研究西夏国不应忽视的材料。将这些典籍中的汉文西夏史料都辑录出来，经过科学地整理，就有可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汉文西夏史料文献。汉文西夏专书文献体裁丰富多样，既有个人撰著，也有官方编修。有纪传体的《西夏书》，编年体的《西夏书事》，纪事本末体的《西夏纪事本末》等。专书文献主要是将散见的汉文西夏史料辑录在一起，按照一定的编纂体例进行改编，一般很少会补充新材料，且较少对所辑史料进行考证。辑录时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这类文献中的错讹较多。

二 汉文西夏文献之研究意义

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西夏文献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俄罗斯学者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随着西夏考古发现的层出不穷和绝大部分俄藏、英藏、法藏及中国藏西夏文献的陆续公布，西夏文献研究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从西夏文献的研究来看，海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是西夏国原始文献（以西夏文和汉文文献为主）的整理和研究，对史、子、集诸部中汉文西夏文献整理和研究取得的成就并不突出，成果数量也比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少数是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这和西夏学学科整体发展水平是很不相称的。学者研究汉文西夏文献，据其研究方式类分，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文献综述类；（二）专书或专题考证类；（三）专书整理类；（四）文献辑录类；（五）史料考辨类；（六）海外访书与书目编修类^①。

汉文西夏文献是中国古典文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有重大学术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丰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史、子、集诸部中的西夏文献是中国古典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学者对这类文献的研究多停留在个案研究的层面上，尚未有学者将其独立成一类进行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因而学界对汉文西夏文献缺乏宏观的把握与了解。即使是个案研究，由于研究涉及的文献面特别狭窄，研究对象缺乏代表性，研究水平又缺乏深度，致使有些具体问题的考证结论不能令人信服。把汉文西夏文献作为一类自具特点的特殊古文献来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将会丰富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内容。（二）有助于西夏学研究的深入进行，有助于西夏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使相关研究成果更加科学、合理。近百年来，在国内外几代学者的努力下，西夏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有浓郁的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综合学科。在西夏国原始文献特别是俄藏黑水城文献未公布前，学者研究西夏，大多是利用汉文

^① 参见拙作《近百年来汉文西夏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述评》，《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西夏文献，但这类文献文本本身需要研究的问题尚有很多，诸如其编成年代、编者生平、史料来源、史料真伪、史籍版本源流等等，这些问题若得不到深入、科学地研究，学者利用汉文西夏文献得出的研究结论就很难说是科学的。科学、系统地研究汉文西夏文献，将会有助于研究者了解在西夏学研究中，哪些文献是最基础、最重要、最可信的，以避免因使用不可靠的文献而得出不科学的结论。（三）有利于西夏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西夏文献学是西夏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学科体系迄今尚未构建起来，更谈不上完善了。西夏文献以西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为主，汉文西夏文献的研究，属于西夏文献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础性工作。（四）对研究与整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献提供有益借鉴。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日渐重视，某些中国古典文献学专著中也开始增设“少数民族文献”专题，一批古代少数民族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但研究多泛泛而谈，某些整理成果水平尚待进一步提高。对汉文西夏文献进行全面梳理、系统研究，这既是对某类古代少数民族古文献所进行的文献学研究，更是为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中确立少数民族文献学的地位而做的开创性工作，故而研究具有了双重的学术意义。另外，对于汉文西夏文献研究之体例框架也会为开展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献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研究范例，这必将会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三 汉文西夏文献之研究方法

结合汉文西夏文献自身的成书特点，可以将其分成宋（包括北宋和南宋）辽金、元、明、清等四个时段来加以研究。对汉文西夏文献按时段归类，要有别于传统的归类方法。传统归类法以文献本身所反映的历史时段来归类，如《宋史》主要反映的是两宋时期的历史，所以一般就把元朝史家编修的《宋史》当做是研究宋朝历史的基本史料，因而把它放在宋朝史料部分来研究。为客观反映不同时期汉文西夏文献编撰所取得的成就，撰写者主要生活在哪一时段，他们撰写的汉文西夏文献也当一并归入那个时段。如《宋史》本纪、志、表、传中散见有大量的西夏史料，更有专题的《夏国传》，能集中反映有元一代史家所掌有的与西夏有关的历史文献的情况，为突出元代汉文西夏文献的特点及成就，就应该把《宋史》放入元代汉文西夏文献中加以考察。

前人对汉文西夏文献，直接利用者多，在徵引时以讹传讹的情况屡见不鲜，对于汉文西夏文献的研究，多停留在对个别散见史料的辨误上，概述西夏文献者没有将汉文西夏文献独立为一类文献，且大多不涉及亡佚文献。对于明清西夏专史，学者多从史源学角度进行研究，研究角度不够全面，研究方法较为简单。我们认为，研究汉文西夏文献，当在继承传统考据学方法的基础上，应该从文献学角度出发，综合运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史料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考”、“述”结合，既有专书的个案研究，又当有综合的宏观评述，研究以“点”带“面”，以传世文献为研究重点，同时亦兼顾对亡佚文献的考证。考证注意引用第一手文献，特别要注意引用出土文献^①，以便增强考证结论的可信度。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先对不同时段汉文西夏文献的成书规律及特点做出概要性的介绍，以便于从总体上了解和掌握此类文献在某一时段的特点，然后再概述或详考各个时段有据可查的汉文西夏文献。对于亡佚者，据目录书和其它有关文献，重点考证其文献名、著者及主要内容。对于传世者，散见文献以

^① 有关西夏出土文献，参见拙作《浅谈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资料及其研究价值》，《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

“述”为主，概述其内容，梳理出篇目或条目，以便学者研究时可按图索骥。专书文献以“考”为主，考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一）作者生平及其著述。对于大家熟知的学者名流，主要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扼要介绍其生平与著述情况。对于从未被人研究过或研究程度不深的学者，则利用多种文献材料，对其姓氏字号、籍贯、生卒年月、仕履、学术成就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缜密考证，以填补研究上的空白，加强研究的力度。（二）文献的主要内容、成书年代及史料来源。在概述文献内容的基础上，举例扼要分析考证该文献在文字及内容上存在的问题，并比较分析该文献与其它文献记述的同类内容的异同。结合作者生平，对专书文献的成书年代加以考证。传世的专书文献主要以宋元文献为辑录史料的来源，考证清楚专书文献的史料来源，可以明确各文献的史料价值及其不足，避免使用了不可靠的文献而得出不科学的结论，避免以讹传讹。（三）文献的版本源流。主要从分析目录著录入手，梳理不同时期著录上存在的差异，理清专书文献的版本源流，指导学者在研究时选择最佳版本。（四）文献的实际卷数。有些西夏专书，目录著录的卷数与传世本有出入，在理清文献版本源流的基础上，找寻著录本与传世本卷数不一致的原因，最后确定哪一种卷数更接近实际。有些西夏专书以残本传世，后人在对其做整序缀合工作时有失误之处，有必要通过缜密考证，对其重新整序缀合，以求恢复专书文献的原貌，以有利于对该文献的整理和使用。（五）文献的史料价值。成于宋元时期的汉文西夏文献是研究西夏的基本文献，这是学界的共识，但成于明清时期的西夏专史，学界对其史料价值看法不一。通过考证，结合相关文献的比较分析，力求对不同时期汉文西夏文献的史料价值做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纠正以往学者在认识上的偏颇，为学者利用汉文西夏文献提供有益的借鉴意见。

四 利用汉文西夏文献要注意的问题

正确、合理地利用汉文西夏资料，对于研究西夏问题至关重要。比如，很多学者研究西夏学，常常引用吴广成《西夏书事》作为一手材料，这样做是很不稳妥的。《西夏书事》引书极广，除《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等纪传体史书外，于《长编》等编年体史书中亦多有采集，另外《栾城集》等宋人文集、《梦溪笔谈》等宋人笔记中事涉西夏者，吴广成也多有辑录。也就是说，《西夏书事》中相当多的西夏史料辑录自宋元文献，这些宋元文献才是更为原始的西夏史料，所以当据它们研究西夏而不能直接将《西夏书事》作为一手文献来引用。

再如，关于宋夏战事，目前在西夏国原始文献中基本还没有相关资料出土或被发现，我们只能借助大量散见于《宋会要》、《长编》、《宋史》等史书中的材料去进行深入研究，同时部分宋人笔记、文集集中的汉文西夏资料也弥足珍贵。如果使用汉文西夏资料不当，或者对资料理解有误，则会导致结论的不可信，甚至可能会误导学人。如西夏王朝第六代国主桓宗之名“纯佑”，目前大多数学者在谈及其名时都曰“纯祐”。考汉文西夏文献，西夏国主桓宗“纯佑”之名最早见于元人编修的《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和《金史》卷十《章宗纪二》、卷十二《章宗纪四》、卷一三四《西夏传》。《宋史·夏国传》凡三见，皆作“纯佑”。《金史》凡九见，除卷十《章宗纪二》一处误作“纯祐”外，其余八处均作“纯佑”。自明以降，桓宗之名多被误写作“纯祐”，清代多数学者沿袭。近现代学者绝大多数都沿袭清人之误，将夏桓宗之名误写作“纯祐”，但也有学者如朱希祖先生等不误。之所以造成这样的错误，除了由于“祐”在年号、人名中屡见外，

最主要的是由于学者对于其名之最早起源不明。因此，笔者认为，在没有相关西夏原始文献证明前，西夏桓宗之名，最好沿用其最早出处即《宋史》、《金史》中的“纯佑”，而不要臆改为“纯祐”。

充分发掘汉文西夏资料，还可以使我们对于某些问题了解得更深入。汉文西夏文献研究中的空白点很多，如宋代汉文西夏地理文献和汉文御夏“议边”文献等专题，以往学者从未涉猎过。明代汉文西夏文献，过去学者谈及的只有祁承燻《宋西事案》一种。清代亡佚的汉文西夏专书文献，过去虽有学者提及，但从未有学者对这些文献进行过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及引用文献上存在问题，以往学者对汉文西夏文献的研究有很多不足，尤其对西夏专史的研究，错误的认识很多。比如，对于祁承燻《宋西事案》的史料来源问题，有学者认为主要取材于宋代史籍的“正史”及其有关的记传、奏议，实际上，《宋西事案》卷上的大部分史料节录自《宋史纪事本末》，而卷下几乎所有的奏议都节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周春《西夏书》，过去学者多沿用清人的说法，认为内容为十卷，其实应为15卷。关于《西夏志略》，并不像有些学者猜测的那样是由学者独立撰著的史学著作，它是清代学者将《古今图书集成》和《续通志》中西夏史料汇编部分抄录出来，内容上未作任何改动，合二为一后冠以《西夏志略》之名单行于世的。

传世文献对于西夏景宗元昊更名“曩霄”事多有记述，如《长编》，《太平治迹统类》卷七《康定元昊扰边》，《东都事略》卷六《仁宗本纪》、卷六六《庞籍传》及卷一二七《西夏传》，《隆平集》卷二〇《夏国传》，《儒林公议》，《涑水记闻》卷十一，《宋史》卷三一一《庞籍传》、卷四八五《夏国传》等均载元昊更名或改名“曩霄”事。实际上，元昊改名为“曩霄”之前的汉译姓名用字应该是“胤霄”，由于“胤”字犯了宋讳，宋朝怒斥元昊，元昊才更名为“曩霄”。由于汉文文献没有直接提及元昊之汉译字名“胤霄”，仅有间接说明，加上对相关文献没有深入发掘，所以元昊更名为“曩霄”之前的实际汉译字名“胤霄”反而不为人所知了。

考诸汉文西夏文献可知，元昊于1038年正式称帝立国后，夏宋之间战争不断，特别是仁宗康定元年（1040）三川口之战、庆历元年（1041）好水川之战、庆历二年（1042）定川之战，三大战役均以宋军大败而告终，但夏国实力也大打折扣，国内民怨沸腾，元昊想以暂时的军事胜利为筹码向宋求和，以图缓解国内矛盾。《长编》卷一三九仁宗庆历三年（1043）春正月癸巳条载：“延州言，元昊遣伪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勛来纳款。先是，庞籍因李文贵还，再答旺荣等书，约以元昊自奉表削僭号，始敢闻于朝。于是文贵与从勛持元昊书至保安军。籍令保安军签书判官事邵良佐视其书，元昊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①但宋朝一直未正面回应元昊求和之书，因为其书中所提及的元昊汉译名用字犯了宋讳。《长编》卷一四〇仁宗庆历三年四月癸卯条载：“著作佐郎、签书保安军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使夏州。先是，良佐与贺从勛诣阙，馆于都亭西驿，承受使臣取元昊书至中书、枢密院，谕从勛以‘所赍来文字，名体未正，名上一字又犯圣祖讳，不敢进，却令赍回。其称男，情意虽见恭顺，然父子亦无不称臣之礼。自今上表，只称旧名，朝廷当行封册为夏国主，赐诏不名，许自置官署。’……仍命良佐与从勛等同往议定以闻。”^②《太平治迹统类》卷七《康定元昊扰边》同此。那么元昊“名上一字”到底是哪一个字呢？我们可以从宋人韩琦的家传中找到答案。北大图书馆藏《忠献韩魏王君臣相遇家传》（明朝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卷三载：“今有函书，内男邦泥定国兀卒圣祖庙讳霄上父南朝皇帝。”^③《丛书集成初编》本《韩魏

①（宋）李焘：《长编》卷139庆历三年正月癸巳。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宋）李焘：《长编》卷140庆历三年四月癸卯。

③案：“霄”上“圣祖庙讳”四字原为双行小字。

公集》(依《正谊堂全书》本排印)卷十二载:“今有函书,内男邦泥定国兀卒胤霄上父南朝皇帝。”但“胤”字少“乚”字旁,显然是缺笔避讳。所以元昊汉译名原本当作“胤霄”,“胤”字犯了宋太祖赵匡胤之名讳。经过数次的交涉,元昊终于在取名用字上做出了让步,更名为“曩霄”。不久,宋朝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长编》卷一五三仁宗庆历四年十二月乙未条载:“册命元昊为夏国主,更名曩霄。”^①这样,在以后的宋夏文书中,元昊的汉译名就一律改为“曩霄”了,而记宋夏之事的文献也多以“曩霄”称谓元昊。又,元昊之汉译名,《石林燕语》卷八、《传家集》卷七六等均作“郎霄”。

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陆续的公布,在中外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努力下,西夏学学科发展越来越受到世人注目。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很有价值的宋元汉文西夏文献基本仍处于散佚状态,已有的汇编成果由于在材料利用和汇编方法上存在缺陷,迫切需要更新、更科学的成果问世以弥补不足。所以在全面摸清西夏文献“家底”的前提下,应该尽快编写出一部《宋元时期西夏资料汇编》之类的工具书。同时,力争使西夏资料数字化。

为使传世及出土的西夏文献更好地为西夏学研究所利用,首先必须对它们进行科学的管理。所谓科学的管理,就是要对西夏文献资料按其内容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建立一个符合西夏文献实际情况的科学的分类体系,以便使西夏文献能发挥其更大的科研价值。在具体类目的设置上一定要体现西夏文献实际内容的特点,立目既要合理,又不能牵强。为了让使用者了解类目的设置原由,了解每一类目所收西夏文献的总体情况,在每一类目中都要有相当于“类序”的综述性质的内容。对于所著录的每一部或每一篇西夏文献,都应当有解题。解题内容包括,被著录西夏文献的书名或篇名,著者名,存佚情况,主要内容,是否被整理或研究过,整理者或研究者的国籍、成果名、发表的时间、发表刊物、成果的主要观点等。最后需要说明著录的依据及所著录的西夏文献的收藏地点。若有必要,可说明有些西夏文献的出土地点。

总之,汉文西夏文献研究是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研究行列中来。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西夏文献研究事业一定会结出更多硕果。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宁夏大学人文学院;邮编:750021)

^① (宋)李焘:《长编》卷153庆历四年十二月乙未。